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地方实践 ——以贵州省为例

杨达 林丽¹

(贵州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在社会经济形态不断演变的宏观历史进程中,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崭新历史方位的背景下,作为后发赶超典型省份的贵州,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地方实践新路。依托“新时代农民讲习所”的打造,贵州培育农民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依托“文化育民、文化励民、文化惠民、文化富民”的“大文化助推大扶贫”方略,贵州开辟脱贫攻坚的新渠道;依托承继优秀传统文化并赋予“红色”革命文化及“大数据”先进理念以时代新解,贵州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全球治理的责任彰显。在农民主体地位培育、脱贫攻坚渠道开辟、“一带一路”责任彰显的进程中,贵州都实现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良性互构。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贵州 脱贫攻坚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9)09-098-10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的十九大的最重要贡献,其中涉及的“五位一体”、“四个自信”等核心内容有关文化元素的强调,也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题中之义。何谓“新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教授解读深刻,“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历史坐标,具备广义和狭义的辩证内涵:就前者而言,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角度出发,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社会经济形态来定格宏观历史时代,可看到“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类历史总体发展大势;就后者而言,则是在上述历史大格局图景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大业也迎来了新的历史方位。广义时代包含了狭义的具体时代,而作为狭义时代的主导者也同时助推广义时代的历史车轮前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上述宏观及微观辩证统一的时空背景下,又特别从以下三个方面凸显了新时代新思想的新内涵:其一,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格局;其二,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启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发展的新纪元;其三,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通过非资本主义道路走向现代化的新途径。^[1]而上述三个方面的新内涵,又进一步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在牢牢把握十九大报告相关内容的基础上,找到客观的载体来具体落实文化建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2]作为后发赶超典型省份的贵州,近年来为实现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围绕党中央积极努力,特别以党的十九大为节点,继续“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延续一直以来的创新尝试,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地方实践新路。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带一路’环境风险防范的绿色治理对策研究”(19XGJ00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发挥后发优势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贵州实践研究”。

作者简介:杨达,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贵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国家战略区域治理与区域发展;林丽,贵州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区域治理、农村区域发展。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农民主体地位培育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 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第五个现代化”也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点内容之一。作为总书记最为关注同时也是国家治理体系最重要支撑单元的基层治理，其中涉及的农民主体地位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可形成互动式建构，而贵州对“新时代农民讲习所”的原创打造，则是开辟上述实践新路的典型代表。由贵州毕节于国内最先尝试打造的“新时代农民讲习所”，旨在以解决基层脱贫攻坚为目标，助力“三农”问题的更好应对。毕节借鉴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做法，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思想，自 2017 年 4 月开始兴办“新时代农民讲习所”，把支部建在生产小组上，积极发挥脱贫攻坚讲习工作的作用，探索出新时代助力“三农”问题解决的新路。2017 年 10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党的十九大贵州省代表团审议时也肯定了毕节的做法。而“新时代农民讲习所”之所以能发挥重要作用，重点在于借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培育农民成为能力更强的基层治理主体，这也正回应了十九大报告中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容时，对于“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等的强调。

目前，“新时代农民讲习所”的打造已在贵州全省推开，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载体，在培育基层治理主体的工作中正实现着新突破：一方面，突破时空局限，通过课堂讲习、流动讲习、云上讲习、空中讲习，实现讲习场所全覆盖；另一方面，拓展队伍结构，依托政策讲习员、技术讲习员、文明讲习员分类讲习，实现讲习人员各展其长，力求在将基层农民培育为具备文化自信且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方面，实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良性互动。其一，培育农民感恩奋进，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意识形态工作推进。讲习所原原本本把党中央的关心讲到群众中去，培育基层群众懂得感恩，切实让农民感受不忘初心的中国共产党，以服务农民、造福农民作为开展“新时代农民讲习所”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基于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着力培育优秀讲习员骨干并依托其讲习凝聚民心，提升农民对党中央的看齐意识以及自觉积极肩负共同助推基层发展的应有责任，推进“大党建”，形成助力基层治理提升的多元主体合力，“拧成一股绳”来造福农村；其二，培育农民综合素质，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讲习所通过政策领域、技术领域和文明领域三支不同类别队伍，讲透与基层农民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好政策，帮助其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扶助其作为基层治理主体的自信；讲好党中央的发展蓝图，帮助其学习切实可行的操作思路，增广其新时代下新农民应有的新智慧；讲明先进可用的科学方法，帮助其学习易学易用的农业技术、掌握相关产业的发展良策。依托“三讲三习促三扶”，不断将基层老百姓发动起来，真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基层农民全方位素质的提升，引导基层群众向上向善，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民主法治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最终推动乡风文明，激发和弘扬社会正气；其三，培育农民能动观念，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思想道德建设。在党的十九大之后，讲习所特别向基层群众讲清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带来理想信念的坚定，实现精神之“钙”的补充；针对“两有户”（有资源、有劳动能力但无门路的贫困户）、“两因户”（因学、因病致贫的贫困户）、“两无户”（无力脱贫、无业可扶的贫困户）、“两缺户”（缺基础实施、缺技术资金的贫困户）等的不同致贫根源，分别讲清楚教育医疗、产业帮扶、社会保障兜底等方面相应的政策，引导群众“对号入座”式脱贫。另外，讲习所致力于连根拔除“等靠要”懒惰思想和“比穷不比富”的错误观念，更新祖祖辈辈的“路径依赖”认知，从思想灵魂深处把群众组织起来，最大限度地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其四，培育农民坚定信仰，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讲习所发挥农村文艺宣传队的作用，把“高大上”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科学知识等寓于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讲习”之中，形成自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替代农村庸俗文艺的正向风气。讲习所还抓住合适的时间节点，让针对性讲习事半功倍，如利用各节庆日，组织讲好勤劳朴实等传统文化；利用农闲时间，普及法律法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利用农业产业发展的重要时间节点，安排好种植、养殖方面的技术讲习，让农民以昂扬的主观能动性和扎实的客观技能，积极发展农业；其五，培育农民发展技能，引导参与基层治理的农民主体因具备硬实力而坚定文化自信。讲习所重点围绕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加快农业科技发展、推广农村实用技术、加强科技实用技术培训等内容开展讲习；立足党的农村政策和脱贫攻坚政策，向贫困群众讲授农村适用技术，开展实用技术和实用技能培训，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科学治贫、科学脱贫；围绕“户户有增收项目、人人有脱贫门路”目标，采取先“讲”再“习”或边“讲”边“习”的方式，到一线开展产业发展、易地扶贫搬迁等方面讲习培训，提高群众知识技能和自我发展水平，帮助农民落实“讲”

的理论“习”的技能相结合。

很显然，贵州“新时代农民讲习所”的实践，不仅为圆发展农业、造福农村、富裕农民的“三农梦”走出了尝试新路，同时也正作为关键物质载体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脱贫攻坚渠道开辟

如果说“新时代农民讲习所”在承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础上，培育了基层治理中农民应积极担当良序体系运转责任的主体地位，那么《贵州省十三五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中围绕“大文化助推大扶贫”主线推动的“文化育民、文化励民、文化惠民、文化富民”战略构想，^[3]则开辟了融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脱贫攻坚的新渠道，而这也正是对十九大报告中有关“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精神的地方实践。

扶贫不仅仅是产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其与文化元素紧密相关，而文化扶贫也不仅仅是指送文化下乡以改变贫困地区的“文化贫瘠”。在客观实践中，一些贫困群众缺乏发展自信，“等、靠、要”思想严重，凸显出文化励志的客观需要；一些贫困人口发展能力弱，凸显出文化育民的客观需要；一些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足，凸显出文化惠民的迫切需要；一些贫困地区特色文化资源丰富但开发利用不足，正好凸显出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拓宽致富奔小康路子的迫切需要。尤其是在很多贫困地区，由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足，给一些落后文化、反动文化以滋生空间，这些地方已经成为意识形态领域两种文化相互争夺的重要战场，直接关系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因此，围绕“大文化助推大扶贫”，“以文化育民增强脱贫攻坚能力、以文化励民强化脱贫攻坚信心、以文化惠民丰富脱贫攻坚内涵、以文化富民拓宽脱贫攻坚路子”，^[4]而上述实践本身，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同步强化。

首先，针对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红色文化，通过以下具体实践做好文化扶贫工作。其一，全省大规模普查革命老区中的革命遗址，留下长征遗产，守护红色家园。其二，在清晰梳理承载红色文化的“家底”基础上，强化革命遗址文物保护，特别针对遵义会议会址及附属陈列馆等一些意义重大的遗址，进行改建和扩建。其三，在传承红色基因的同时进一步让长征遗产活起来，即在重要的长征纪念地建设长征主题的纪念馆，如围绕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苟坝会议、四渡赤水等重要历史事件，分别建立了纪念馆。其四，通过打造红色文艺精品来再现红色故事，激励基层人民坚定自信奋发向上。其五，举办红军文化节等红色主题活动，依托特定场景的营造让群众共建共享长征文化，丰富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其六，打造长征文化精品旅游路线，于黔北、黔西、黔西北、黔南、黔东南、黔东六大区位规划建设有较为广泛影响的重点红色旅游区。事实上，贵州定位为革命老区的地区很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但却有发展红色旅游的历史资源和后发优势，可依托发展红色旅游实现老区经济发展方式由“救济型”向“开发型”转变，既给本地区带来经济效益，还能为周边地区带来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收益。

贵州还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统手工技艺，寻求由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的独特扶贫路径。《贵州省传统手工技艺助推脱贫培训计划(2016—2020年)》重点涉及了省内将启动的“十、百、千、万”培训工程，意指：“培养(培育)数十名大师级传承人、数十名国内知名手工艺品设计师；培养(培育)数百名传统手工技艺骨干传承人，数百名省内知名手工艺品设计者、市场营销人员；培养(培育)数千个传统手工技艺传承骨干；动员数万名传统村落贫困农户参与传统手工技艺培训，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就业人数新增上万人。”该计划推出后，立即成为传承非遗文化、助力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

第一，在传承历史文脉中体现文化扶贫的育民功能。“坚守传统，不失其本”是“十百千万”培训的基本原则，要求在保护传承、合理利用传统工艺的时候一定要尊重传统文化，尊重传承人的审美传统，坚守传统手工技艺底线，保护传统工艺的多样性和独特性。目前，“十百千万”的培训实践已取得一定成效：一是从老百姓角度出发，采取分级分类分层进行培训，让各种类别各种层次的传统工艺持有者都学有所得，真正体现以人为本、人人平等的育民和惠民功能。二是充分尊重基层(村寨、传统工艺企业和县文化部门)意见，推荐人员参加培训，所有参训的学员都必须学习某一种传统工艺的历史文化内涵和民俗文化，以便

以后制作或教习徒弟时能做到“心中有数”，并身体力行守住底线，留住文化根脉。三是通过“千”、“万”的培训，在传统工艺流传地区大面积培养传统工艺传承人，通过培训让更多的群众在了解传统工艺文化内涵的基础上认真传承属于他们的传统工艺。

第二，强文化自信彰显文化扶贫的励民功能。改革开放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受市场经济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人们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很多人对本土民族文化认同感很低，传统工艺也因此遭受冷落。在这种情况下，传承人靠着自信、责任和坚守，艰难传承着老祖宗世代传下来的传统工艺。为树立民族认同感和自信心，“十百千万”工程在对学员进行培训时，通过讲授传统工艺历史文化内涵、民族文化知识等提升认同感和自信心；通过授予国家级、省级、州级、县级传承人，工艺美术大师，传统工艺技能大师等称号，鼓励参加传统工艺大赛获奖等增强荣誉感和获得感；通过培训让更多的老百姓掌握传统工艺技能，为传统工艺产业发展提供特殊的人力资源支撑，为提升区域影响力和助推传统工艺品牌打造打好基础。

第三，带动群众致富显现文化扶贫的富民功能。贵州省以“十百千万”为抓手，全面推进培训工作，让传统工艺保护传承与合理利用协调发展，并且以此带动产业发展助推脱贫攻坚。一是强化多元培训确保群众就业。通过培训，从思想意识、创作理念、制作工艺、文化内涵、现代管理等方面，强化培养了产品设计研发、生产、营销、管理等产业链各环节急需的各种人才，为传统工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支撑。特别是“千”、“万”的培训，让参加培训的老百姓（主要是贫困群众）提升了综合素养，提高了认识，从一般劳动力转化为具有传统工艺技能的生产者，解决了就业，增加了收入。二是提升产品质量让百姓稳定增收。通过培训，让参训者（特别是传统村落老百姓和贫困群众）对制作材料、制作技艺等有深刻的认知，树立了看传统工艺即看人品，真正的传统工艺是“优质材料+精心制作”的意识，自觉在保护传承中提升品质，通过在产品上署名，品质自负，担当责任。让品质过硬的传统工艺品在政府搭建的平台上展销，有效提升传统工艺的公信力和知名度，提高了市场竞争力。销量提升反过来又刺激传统工艺的生产，让产业得以良性循环发展，群众稳定增收。三是拓展产品种类带动更多百姓致富。“十百千万”工程坚持传承和创新相结合，通过多部门跨界合作，多学科协同发力，培养建立国家、省传统工艺技能大师工作室，促进特色文化元素、传统手工技艺与创意设计、现代科技、时尚元素完美结合，在保护传承中推陈出新，拓展产品种类，扩大销量，带动更多群众致富。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一带一路”责任彰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农民主体地位培育、脱贫攻坚渠道开辟的彼此建构，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丰富完善，而上述着眼国内层面的全盘运作，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中国的全球治理尝试筑牢根基，并通过“一带一路”彰显大国责任，其背后逻辑在于：着眼互利共赢的“一带一路”带来了全世界的协同发展，将国内治理提升、脱贫攻坚的切实行动向外界延伸，而不断得到认同的“一带一路”也会将承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带向世界。十九大之后，“一带一路”建设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展现了党中央对于“一带一路”顶层设计的高度重视和长期坚守，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联动，也将更好应对“一带一路”推进中所面临的各类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包含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先进文化，中国今天欲依托“一带一路”建构新型国际关系，并担起世界“孤立主义”抬头背景中的全球治理责任，便需首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从国家治理到全球治理的丰富养分，这也更确定了中国可以通过自身熟悉的传统智慧来切实推进“一带一路”与外界的联通。历史上，中国拥有博大精深的关于人类公共事务治理的思想：“早在西周时期，周公便提出‘保民’、‘慎罚’思想；诸子百家时期，孔孟提出系统的仁政和王道理念，《礼记》描绘出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社会，慎到和韩非提出系统的崇尚法治和反对人治的思想，道家和黄老学说崇尚顺应民情和无为政治；《公羊传》提出‘华夷之辨’和‘尊王攘夷’的文明间秩序理念，《太平经》则提出财物公有、互助互养的‘太平盛世’设想。此外，还有唐宋盛世时期‘民本’、‘爱民’和‘公天下’的理念，明清时期知识分子和改革家们对专制暴政的深刻批判等。上述治国理政的思想以及对理想社会的设计为后世思考公共事务的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5] 鉴于此，中国应坚守从国家内部到国际外部的治理“开源程序”，即在寻求不仅着眼国内还关注国外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上，同步创新全球治理的中国话语体系。与此同时，不能因西方在很多领域、不同层面均主导了所谓的“现代化”就简单将该名词与“西方化”等同，而需认识到“现代化”的动态发展内涵，这一内涵同样可由基于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积累而来的国家治理经验不断丰富，由此也便形成了“一带一路”应运而生重要时代叙事。^[6]

从致力于地理环境和政治现象间互动联系及因果关系研究的“地缘政治”视角出发，“一带一路”倡议是地处东亚、毗邻多国的中国，基于互利共赢、世界减贫、协同发展等良善愿景来处理与周边乃至世界国家关系的建设构想，本是着眼国家层面的问题，但作为国家“黑箱”内部更小单元的各个省份，同样需要基于自身地理特征的要素禀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形成对“一带一路”推进的切实支撑。作为“一带一路”南通路重要补充的“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贵州通过打造“孔学堂”以传承儒家经典等相关行动，在切实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又通过将革命文化和先进文化建设与国家顶层设计相连，助推“一带一路”的责任彰显。

事实上，革命文化并非狭义地理解为向世界输出革命，而是强调不屈红色精神能为世界带来的贡献。上文提及贵州依托红色文化打造经典旅游路线，不仅是通过提供就业岗位、带动沿线消费开辟扶贫新路，而且是为了形成一种文化上对外界的吸引大势；不仅是要吸引国内其他省份的旅客前来游览，而且是要对近及东南亚远至大洋彼岸欧陆彼端的外国学者和游客形成“磁吸”；不仅呈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艰辛历程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发展奇迹，同时传递中国今天不是向世界输出革命，“一带一路”也不会带来世界秩序变革，而是以革命文化坚定相关后发国家民众信念，并通过“一带一路”“搭台”、相关国家“唱戏”的方式助力其探寻因地制宜的现代化路径，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基础上的国家间“民心相通”。

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则包含了为现代化事业提供智力支持的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文化，也正如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2]的科学发展理念，贵州正在先进文化引领下抓住“蓝色”科技机遇，使后发赶超不是囿于传统意义上做他者的短板，而是尝试做他者不具唯贵州特有的“独板”，打造“贵州的大数据—中国的大数据—世界的大数据”，并助推国家“网上丝绸之路”的互联互通。2015年，首个国家级大数据中心落户贵州，之后在贵阳召开的“2017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亦引起世界瞩目，“数字经济引领新增长”的创新理念给予贵州借助新兴科技实现后发赶超并助力国家战略推进的重要机遇，其背后便是把握先进文化带来现实发展质变的深刻逻辑。按照“资本的能量生产率”的工业化理论，“资本”意味着非金融属性的资本品供给，而这种资本品能够带来生产力的大幅提升，其背后逻辑在于：传统的体力劳动只能产生低等级的能量供应，而包含机器设备等在内的新型资本形成了高等级的能量替代，也便是前两次工业革命中人类利用自然能量驱动的资本替代体力劳动从而摆脱体力作为动力来源的限制。例如，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诞生标志便可具象为以蒸汽机动力支撑的纺织机械等工具机的革命，动力程度及单位成本都相对人体肌肉具备明显比较优势的蒸汽动力替代了体力劳动。不过，从“生产率”替代的角度出发，前两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存在明显差异，即以蒸汽器等为代表的资本只是突破了人体肌肉力量的限制，而以计算机为代表的资本则形成了对人体脑力活动边界的不断突破，而之后的人工智能系统、大数据及云计算等互联网革命的出现又奠定了“资本的智能生产率”和工业智能化的关键性影响。^[7]很显然，“资本的智能生产率”是相对“资本的能量生产率”而言更为高级的工业化新阶段，其颠覆了此前物质交换及其生产遵循报酬递减的规律，形成信息和知识交换及其生产遵循报酬递增的新循环，由此也决定大数据带来的指数性增长前景无可限量，以及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形成的新型资本替代脑力劳动并进而大规模替代体力劳动的工业化。^[7]依托大数据，贵州迎来的不仅是与世界“数据丝绸之路”的联通，更承载了吸引世界的先进文化建设。

四、结语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璀璨之树”得以常青，关键便在于文化建设过程中特殊与多元辩证统一式的不懈实践。从打造“新时代农民讲习所”培育农民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到依托“文化育民、文化励民、文化惠民、文化富民”开辟“大文化助推大扶贫”的脱贫攻坚新路，再到承继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赋予“一带一路”“红色”革命文化及“大数据”先进理念带来的正向责任彰显，贵州探索的是国内与国际扶贫、内部与外部发展、国家与全球治理辩证式实践基础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与地方具体实践融合后，助力“一带一路”顶层设计的更好推进，让文化真正成为助力国家方略运作的强力势能。

“一带一路”依托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传递共享的全球性价值导向，也助力政策沟通中促进政治互信与合作共赢目标的实现。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全球治理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时空视野和活动领域，互联网技术的日趋成熟和世界交通体系的日益完善，使得人们能够实时了解世界每个角落发生之事并将自身活动范围从国家地域延伸至全球范围，这些都为全球性观念的塑造创造了客观条件。正是在人们的价值认同从此前局限于国家范围内转向对旨在解决跨国共同问题的全球机制认同的背景下，各国因经济发展水平、制度体制等差异而呈现不同国家关注与着眼全人类共同需求的全球利益开始碰撞融合，导致“不同国家利益的相互依存性与全球性危机的共同性促使各国在全球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认同和全球性凝聚力，通过开展各种超越国界的全球合作来应对全球挑战，不断增扩全球价值共识和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有效协调和化解国家与人类的利益差异，而且要求国家行为体从长远出发，将自身价值和本国利益融入人类整体价值和全球共同利益，在追求、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关注和兼顾全球整体利益”^[8]。推进以全球整体利益为己任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对全球价值的塑造，而良善愿景的他者认同，则需要不同地方的多元特殊实践，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得更具吸引力，并以此形成对全球性价值导向的正面强化。

参考文献:

- [1] 王伟光.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体会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7(12):9—13.
- [2]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 [N]. 人民日报, 2017—10—28.
- [3] 《贵州省十三五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全文和解读 [EB/OL]. 中国经济网, 2017—06—21, [http://www. ce. cn/culture/gd/201706/21/t20170621_23759411..shtml](http://www.ce.cn/culture/gd/201706/21/t20170621_23759411.shtml).
- [4] 杨达, 林子. 坚定文化自信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J]. 红旗文稿, 2017(21):29—30.
- [5] 刘贞晔. 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互动:思想渊源与现实反思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6(6):36—46.
- [6] 刘雪莲, 姚璐. 国家治理的全球治理意义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6(6):29—35.
- [7] 贾根良. 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工业智能化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6(6):89—99.
- [8] 吴志成. 全球治理对国家治理的影响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6(6):22—28.